

运城文史资料

第二辑

(总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运城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运城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组成人员名单

主任委员：付仁智

副主任委员：孟肇咏 张志德

委 员：王卫管 孟海生 霍子江

介福平

编 辑 室：

主 编：介福平

副 主 编：裴 璞

编 辑：赵瞻国 苏文娟 谢跟管

校 对：王灵花 王建省

目 录

- 运城百年.....
-中共运城市委宣传部 赵瞻国 (1)
- 曹于汴传略.....
-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 裴 璞 (77)
- 丁丑赈荒记.....
-运城市第一高级职中 王永年
-政协运城市委员会 介福平 (97)
- 薛笃弼略传.....
-运城盐化局四厂 李竹林
-政协运城市委员会 王卫管 (126)
- 清政爱民的李崢龄知事.....
-运城市解州中学 刘龙光 (131)
- 景梅九先生与李尤白.....
-运城地区方志办公室 吴麦黄 (134)

运 城 百 年

赵瞻国

1947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把战旗插上河东古镇运城城关。

时光荏苒，几度春秋，运城解放已经四十年了。

在祖国1000万平方公里的漠漠大地上，区区运城可谓沧海一粟。古人云：以史为鉴。俗话说：一滴水可以映照太阳。在运城人民欢庆历史性胜利，为完成十三大提出的各项任务而奋发努力的今天，回顾总结百年来运城经历的坎坷曲折和沧桑巨变，不也可以获得更为深刻的启迪和新的精神力量！

古华夏王冠上的明珠

传说当年舜王骑乘凤凰飞临河东上空，看到这里山青水秀，物华天宝，便降落下来，躬耕播种历山（中条山）坪，抚琴吟颂银湖畔。因此运城有了吉祥的名字凤凰城、圣惠镇。

运城濒临盐池，池盐声蜚古今，名闻遐迩。运城也被誉为盐邑、盐城、鹽（音古）城。

其实，运城的前身是个仅有数户人家的大村，位于今市区北郊（行署粮食局一带）叫潞村（现称潞村巷），故运城池盐也称潞盐。那时，运城还是“盐贩之泽”。西汉“盐铁

官营”，运城开始有盐政官员，设司盐机构。汉为“司盐都尉”，唐置“两池榷盐使”，宋、金、元均置“盐运使”。随着盐业的发展和官府的经营，运城被逐渐开发营建，初具城镇规模。元至正丙申（1356）年，盐运使那海德俊开始建筑新成，并将盐运使司由解州迁来。因新城有盐运使司驻扎，故称运司城，后来便直呼为运城了。

据考古发现和史籍记载，运城有数千年历史。即使从那海德俊建筑新城开始，也已631年了。运城和所属的河东地区，是中华民族文明发祥地之一。运城地灵人杰，在古老华夏的开拓、发展史上，谱写了辉煌壮丽的篇章。

解放后，运城陆续发现了丰富的古文化遗址，仅新石器遗址就有9处。7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运城燃起了文明的火种。至今，运城留有女娲炼石补天处，风后故里，蚩尤城，哑姑泉，尧梦村，禹都安邑，商汤故里，舜都虞坂，舜帝庙，魏都遗址，以及黄帝大战蚩尤，风后发明指南车，蚩尤骨血化卤聚池成盐，嫫祖发明养蚕，后稷教民稼穡，杜康造酒，商汤伐桀战于鸣条等古老传说。这些都反映出运城早在荒古时代，已是黄帝氏族的居住区域，成为华夏民族的滥觞之地。运城历代还养育过关龙逢、魏文侯、商鞅、李悝、吴起、段干木、卫夫人、刘伶、关羽、柳宗元、关汉卿以及贺仙姑等帝王将相，圣贤名士，实可谓英才辈出。

运城地处黄、汾交汇的三角地带，自古属京畿之地，居华夏腹心。襟山带河，形胜要冲，地理环境优越，自然资源丰富。历经各代或建都、郡，或设道、州，或置署、衙，人文荟萃，经济繁荣。尤其是运盐曾供华夏20余州，各朝均以

盐池之利充裕国库，支付财饷，被视为“国之大宝”。运城繁盛之时，商贩云集，车马载道，被誉为“三省之都会”。汉武帝、汉章帝、唐太宗、清康熙帝都曾驾临运城，巡视盐池。包拯、欧阳修等名人被委以运城盐政官员。

运城，不失为古老华夏王冠上的一颗熠熠耀目的明珠！

可是，清朝中叶，特别是1840年以后，运城人民处于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遭受列强侵袭。运城这颗宝珠曾被攘入帝国主义魔掌，蒙受了历史的灰垢与屈辱。然而，智慧、勤奋、质朴、勇敢的运城人民，不会容忍外族入侵与宰割，不会屈服于反动统治和压榨。他们前仆后继，经过几代人的摸索追求，历尽血与火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顽强地挺立起来，争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性胜利。又经过四十年艰苦创业，把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旧运城，建设成为初步繁荣的新兴城市。党的十三大后，运城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踏上了新的征程。

回首往事，为有今日，历史曾付出多大代价，运城经历了多少磨难哪！

中华复兴的先声

运城近、现代史上经历过三次解放！

第一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是一次革命性质的解放。在运城发动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迎来运城复兴曙光的是以景梅九为代表的一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

景梅九是本市安邑人。他1902年从京师大学堂赴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如饥似渴学习研究各种进步思潮。他结识了

孙中山先生 和秋瑾、井勿幕、宋教仁，李烈钧、唐继尧、张继等创办报刊，建立组织，开展反封建专制斗争。

1905年夏，景梅九回安邑度暑假期间，和本市西曲马村的李岐山，在安邑、运城、羊驮寺以及猗氏、万泉等地聚众演讲，开启民智，宣传民主自由思想。同在安邑成立“天足会”，倡导妇女放足和禁烟。他还和李岐山在运城北大街赁房创办了“回澜公司”对外经售戒烟药，实为革命者活动据点。

是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领导成立了同盟会。景梅九暑假后回到东京，立即加入同盟会。1906年为争山西矿权回国，他在安邑介绍李岐山、郭朗清、周歧伯、裴子清、关克昌、苏连三、李秀等加入同盟会，为运城的辛亥革命播下了火种。之后，景梅九的夫人阎玉青以及阎玉青的弟妹都参加了同盟会。这批骨干在运城各地积极活动，准备光复运城。

1911年10月29日，山西民军在太原起义一举成功。正在北京从事革命活动的景梅九，接到阎锡山密函，立即带领同志返回太原，出任山西军政府政事部长。不久清军攻下娘子关，阎锡山离太原北走，景梅九和付都督温寿泉以及李岐山等率部分民军南下河东。在陕西民军援助和运城革命党人接应下，是年12月29日运城光复了！

温寿泉、景梅九、李岐山，还有运城革命党人薛笃弼、邵修文以及临晋、猗氏、芮城等河东革命党人景耀月、王用宾、张实生等，都先后汇聚运城，和陕西战友会合。运城和河东辛亥革命进入鼎盛时期。

孙中山先生对山西革命极为重视，南京临时政府特派员

王北方于1912年1月1日抵达运城。第二天，运城的同志召开隆重大会，欢迎王北方的到来，欢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同日也成立了河东晋军政分府。随后派出军队夺取安邑、猗氏、夏县、荣河、绛州诸州县，北伐平阳（临汾），南拒黄河，声势一时大振。这年11月30日，张实生等在运城成立同盟会运城支部，在各县发展会员，建立组织。这样运城不仅成为河东光复的基地，而且是山西辛亥革命的中心之一。

运城多少好儿女为推翻千年帝制，光复中华，不惜为国捐躯。他们的奋勇斗争事迹可歌可泣。

太原民军起义后，运城同盟会员李秀和张实生、阎玉青、阎虎臣、王建基、李正清、王平正、王世选等革命党人开会研究起义事宜。他听到陕西民军东渡来运的消息，主动要求北上侦察敌情，迎接秦军。李秀临行前向战友表达了以死报国的决心。他行至猗氏牛杜镇，被绛州清军统领陈政诗的前锋抓捕。清军审问，李秀拒不回答。清军用枪威逼，他只蔑视一笑。清军剥光他的衣服，用竹片抽打。面对敌人残酷刑讯，他高喊：“我就是革命党人！是来这儿迎接过河的陕西革命军的！我们一定要杀尽你们这伙汉贼！”运城光复的消息传到牛杜后，清军把李秀拉到镇外。李秀含笑饮弹，壮烈牺牲。

朱丽生是运城城里人，太原警务学堂毕业，去山西最北端的丰镇县（现属内蒙古自治区）供职。他的新婚夫人董氏，是本市解州人，也随丈夫去丰镇。丰镇是长城得胜口外第一个县城，京绥出入孔道，距离晋北重镇大同100余里，是山

西省的北方前哨。太原起义后，朱丽生夫妇和革命党人，联络当地会党武装，组成民军，于当年12月11日光复了丰镇。朱丽生被公推为丰镇县知事，准备乘胜南下大同。不幸民军兵败，朱丽生被清军杀害，时年26岁。清兵枪杀朱丽生时，夫人董氏在旁。她从容地脱下外衣盖在丈夫尸体上，然后自绞内衣领子，伸颈就刑：“快动手杀吧！”清军兵士被她的贞烈所感动，不忍杀害，告她：“不关你的事，快走吧！”她说：“妇人从一而终，丈夫已死，我义不生，快杀我吧，再多说！”董氏遂亦被害。这一对运城儿女的不屈头颅还一起被悬于丰镇南门。

可是，辛亥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浇灌的胜利果实，很快被新的封建专制独裁者窃取，革命志士和民众横遭羁难。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南北议和，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粉墨上台，阎锡山于4月回到太原。雄踞运城的河东晋军政分府，这时兵力已经发展到一、二万人，引起了阎锡山的嫉恨与不满，借口全省统一削减兵力，将运城所有部队改编为一个混成旅，李岐山任旅长。河东晋军政分府要求给予一个师建制，遭到阎锡山反对。7月12日，成立半年为山西辛亥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河东晋军政分府就正式宣布撤销。留在运城的张实生、李岐山，对阎锡山已有戒心，这时只好暗中保护实力。李岐山率队上鸣条岗屯田养兵。

运城革命势力的存在直接威胁着阎锡山的独裁统治，成为他的一块心病，处心积虑欲加根除。阎锡山电告袁世凯，说李岐山、张实生等人在河东聚兵阴谋叛乱，请加讨伐。袁世凯早对山西革命势力恨之入骨，有意铲除李岐山、张实

生。遂于1913年春，调河南、河北军队夹击运城，将李、张逮捕，押解北京，以“称兵作乱，危害民国”罪判刑下狱。1920年秋，阎锡山插手密谋，将李岐山暗杀于西安东郊。景梅九1916年初在西安从事反袁起义，被袁世凯扣捕押解北京入狱。半年后袁世凯暴卒，景梅九被营救出狱，继续遭受阎锡山迫害，不得回省，在外地从事反阎、反北洋军阀的斗争。阎锡山还打击太原民军起义总司令、河津志士姚以价，使姚以价1912年一气之下离开山西，至死35年再未回故乡。

阎锡山与袁世凯相勾结，迫害排挤河东辛亥革命志士，还在晋北挤走了续西峰、续范亭等人，从此在山西建立起专制独裁统治。河东各地的民军和游击队遭受镇压，运城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一时风起云涌，然而昙花一现。运城的辛亥革命也很快归于失败。

总结运城的辛亥革命，从中得到什么教益呢？

没有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政策，失去了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阶级的拥护与支持，势单力孤，独掌难鸣，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其实清末和辛亥革命时期，在运城以及河东地区，以会党为主要斗争形式的民众反清活动此起彼伏，很是活跃，到处发生农民起义和骚动。1905年7月，平陆茅津一带哥老会起义，攻打清军哨所。绛州会党率众起义，一度攻入绛州城，反抗外国传教士欺压平民和清朝反动统治的暴行。这些带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自发民众武装斗争，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之后。可是，包括河东晋军政分府在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派，在斗争实践中，没有能够为他们指明方向，制定和执行发动联合农民和其他反清力量的政策措施，不能满足和保护他们斗争的正当要求和愿望。革命党人在起义初期曾吸收过一些农民起义武举和反清的会党武装。例如，浮山县陈彩彰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曾被河东晋军政分府收编，陈彩彰被委以东路招抚委员。但更多的是对广大民众的革命情绪不能及时的组织引导，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而是不信任，不重视。尤其是在运城光复，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后，对各反清力量参加革命队伍的要求漠然置之，拒之门外。当民众不满而反对新政权时，河东晋军政分府竟然分不清敌友，视之为“匪党”派兵镇压。这就直接把新生的革命政权置于广大民众的对立面。被逼压的民众武装，甚至把张实生、胡子毅的家庭抢劫一空，矛盾尖锐激烈。当时河东地区与陈彩彰齐名的杨永升，是河南无业游民，在永济黄河滩给人种瓜。太原民军起义后，杨永升积极响应，在永济、临晋聚众反清。经请求被编入陕西民军，参加了攻打运城、绛州战役，立下战功。河东晋军政分府成立后，不愿接纳他们，杨永升对此表示不满。温寿泉和张实生调集部队镇压了这股反清地方武装。芮城县以杜青山、梁老五等为首领的群众武装，反抗清朝和土豪劣绅。河东晋军政分府却受当地豪绅和清府官员挑拨中伤，派兵连夜前往“剿灭”。安邑党人郭朗清到芮城担任县知事后，又捕杀了一部分武装群众。这样，社会基础本来就不深厚的河东革命政权，逐渐失去了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这就很难抵挡袁世凯和阎锡山的合流夹击。辛亥革命失败后，河东各县的农民起义也被镇压下去。

陈彩彰1912年7月10日在浮山组织领导了第二次起义，攻陷县城，镇压贪官污吏。阎锡山14日电令平阳团长、河东晋军政分府成立时和陈彩彰分别被委任为北路、东路招抚委员的张煌率部镇压。阎锡山继而又派大同、太原、潞州、绛州、辽州、沁州的军队围剿。陈彩彰起义一直坚持到1915年，是年6月27日陈彩彰病逝，起义才被血腥镇压。

运城革命党人在政治斗争中暴露出来的软弱妥协与幼稚，还表现在轻易拱手让出政权，而使新的独裁统治者有机可乘，致使新军阀上台，封建专制复辟。这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另一个原因。革命党人没能认识民众的革命力量，着眼点不是放在依靠广大民众，以武装斗争推翻清朝统治，巩固新生政权，而是狭隘、肤浅地把希望寄托在辛亥革命中浮上来的新的“权贵”人物，包括革命队伍和清王朝中的非满族的实权人物。山西军政府初肇，景梅九回到太原后，曾代阎锡山给袁世凯、段祺瑞等人上书致电，只要能使清帝下台，承认袁世凯当总统。景梅九代阎锡山写给袁世凯的一份咨文说：

“阁下如能协同民军，颠覆专制，然后敷政共和，与民更始，则第一任大总统舍公其谁？”那种清势下，景梅九和阎锡山都同意袁世凯作总统。对山西政局来说，河东晋军政分府成立后，尽管张实生、李岐山对阎锡山有戒心，可是温寿泉等领导人还是多次致电袁世凯，力争阎锡山在山西名正言顺的最高领导地位，呈请袁世凯同意阎锡山速归太原重新主持军政府。并且上书阎锡山：“大局既定，晋军政府不宜南北分立，请速进省组织一切”。阎锡山1912年4月回到太原，温寿泉又致电阎锡山：“公既回省，全省军政亟宜统

一，河东各机关理应一并撤销。”在南北议和，撤销河东晋军政分府等重大问题上，以及具体实施过程中，运城的革命党人表现出妥协退让，软弱无力。例如，当时各政治力量都感到武装的重要性，在兵力格局上各打各的算盘。袁世凯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借整肃地方实现统一为名，削砍各地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阎锡山返并，仰袁世凯鼻息，借机排除异己，裁减河东的革命武装。河东晋军政分府提出一个师的建制，阎锡山坚决反对，只好缩编为一个混成旅。这时，身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次长的芮城党人景耀月，曾在运城主持召开同盟会运城支部会议，支持河东晋军政分府拒绝阎锡山改编河东部队，裁减兵员的命令。但这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并不能奏效。1913年初，张、李被捕，运城同盟会支部也就停止了活动，会员只好各奔东西。一度蓬勃发展的河东辛亥革命，顷刻归于失败。

实际上，运城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袁世凯、阎锡山早已存在矛盾与斗争。在全国，袁世凯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包括不承认河东晋军政分府之存在。后在孙中山力争下，阎锡山也密向袁世凯表示服从和效忠后，袁世凯才同意阎锡山回太原。可袁世凯还给河东晋军政分府来电，责备付都督温寿泉在运城不应擅自委任晋南镇守使，要求迅即撤回。袁世凯接着委派了新的晋南镇守使。在山西，阎锡山则对河东晋军政分府的存在与日益强大深为不悦，设置种种障碍从中作梗。1912年4月陕西民军离运回秦时，河东晋军政分府通过会议决定，酬赠秦军600万斤潞盐。阎锡山对此也大为不满，抓住不放。仅为此事双方费了不少周折。清帝倒台

后，河东晋军政分府派人接任平阳清军将领之职，阎锡山也从晋北派人前往，两方的“接收大员”形成争权之势。经过40多天争夺，还是让阎锡山得逞。

在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农业大国之中，在长达两千余年封建专制统治的环境中从事民主革命，远不是民主革命先驱们在辛亥革命初胜时感觉的那样轻松、容易。革命志士们在同混在革命潮流中的封建专制势力的新的代表人物斗争中，缺乏政治目力，缺乏军事实力，因而刚争到手的政权又很快得而复失。一旦那些同外国帝国主义与官僚买办势力相勾结的新军阀得势，就会残酷镇压革命党和群众。当年运城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中坚力量，多数遭迫害，被排挤。

帝国主义的入侵，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相互勾结，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另一社会原因。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由于阶级的局限性，总是同大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他们缺乏自己的雄厚实力，得不到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强有力支持，也就很容易把希望寄托在大官僚资产阶级身上，受到他们的欺骗和威胁。当这三种恶势力相勾结，背叛革命袭击革命力量时，也就不堪一击，醒悟过来时已经晚了。辛亥革命之后就接连出现袁世凯恢复帝制、张勋复辟、曹锟贿选等政治丑剧。孙中山带领资产阶级革命者奋斗终生，直到去世未能实现真正民主、自由、共和的政治理想。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又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大官僚资产阶级终于在革命者的血泊中建立起反动黑暗的统治。尽管景梅九和他当年的战友，反对蒋阎独裁专制，可直到1947年运城解放前

夕，景梅九还带人到南京向蒋介石国民政府请愿反阎。得知蒋阎早已勾结，这才最终同国民党反动派划清界限，断然参加了“民革”，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运城光复不久，河东晋军政分府就成立了河东潞盐临时管理处，可是袁世凯上台就将潞盐收回，转手出卖给英帝国主义。这样就有了运城最早的两幢洋楼。只有1947年运城解放后，盐池这颗河东宝珠，才真正回到人民手中。现在当我们经过这两幢洋楼前时，它留给我们的昭示应当铭记：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曾经生气勃勃，风起云涌，一时推翻了清王朝的黑暗腐朽统治，敲响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的丧钟，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辛亥革命很快失败了，中国又越来越深地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表明，历史进入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大国中，民族资产阶级由于阶级的局限和历史条件的变化，已经失去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领导能力、条件与地位。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都不可能把中国引上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道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一历史使命已经落在了新的革命阶级——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肩上。

运城人民不屈不挠，继续奋斗，寻找着彻底解放的道路。

民族新生的“阵痛”

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运城人民经过8年

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空前胜利。但是，运城人民没有能够得到抗战胜利的果实，仍然处在蒋、阎反动统治之下。

“上皇帝”阎锡山在辛亥革命中浮上了山西政治统治的宝座，先投袁世凯，后跟蒋介石，成为大地主、大官僚资产阶级在山西统治势力的代表。1914年，运城驻河东道，辖解州、安邑等县，开始成为阎锡山在晋南的统治中心。1931年“9·18”事变，日军出兵侵占我国东北，国内政局骤变。阎锡山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镇压共产党领导的日益高涨的民族抗日斗争。蒋阎反动派倒行逆施，“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致使日军长驱直入。1937年“7·7”事变，11月8日太原沦陷。1938年2月，日军进逼晋南。阎锡山驻运城警备司令秦绍观3月2日弃城逃跑，运城国民党中央军和阎锡山晋绥军惊慌溃散。3月4日，日军占领安邑县城。3月5日，日军几乎未动枪炮进占了河东重镇运城。日本占领军在运城置河东道日伪政权，领辖安邑、解县等晋南36县。日军在运城大肆虏掠财产，屠杀我国人民。日本帝国主义的“以战养战”、“三光政策”，给运城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1939年4月15日，日军包围稷王山下的上段村，不论男女老幼，枪杀、刀砍、棒打、火烧、马拖、剥皮、开膛，屠杀手无寸铁的村民，把尸体抛入深井。敌人退后，从井中打捞出尸体94具。另外还有14名抗日战士也殉难。当时全村103户400多口人，共被杀害104，长者64岁，还有吃奶的婴儿，四分之一人口被杀，9户灭门绝户，39户家破人亡。张

永成一家10口全被杀害。烧房87间。上段村无家不帶孝，遍村抬棺人。这就是日军制造的震惊一时的“上段惨案”。

沟西庄是运城市北部边陲的一个偏僻山村，与万泉接壤，30余户人家。1941年7月31日晚，日军突然包围了村子。第二天一早，挨家搜索，遇见村民就杀，无一幸免。顿时血流遍地，身尸横卧，共被杀害79人。这就是日本强盗制造的“沟西庄惨案”。

稷王山上的牛庄是我党领导的稷麓县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位子我市与夏县的交界处。日军在牛庄先后残杀无辜村民90多人。仅1942年5月23日一次屠杀63人。牛庄的9名地下党员8名遇害。日军在牛庄先后放大火8次，共烧毁房屋1200多间。1942年1月，全村120户人家，除5户未烧外，其余全被烧光。9座戏台、6座大庙、9座小庙、4处祠堂，计300多间村公有房屋也全部焚之一炬。被称为“小北京”的牛庄，变成了一片废墟。

还有“三路里惨案”、“张良村惨案”、……。

日军占领期间，在运城屠杀我同胞成千上万。据阎锡山安邑县政府的调查统计，自1939年3月1日至1945年8月20日，县政府损失约值时价643万元。安邑县城内损失5540万元。运城、安邑两城商业损失47726万余元，各乡镇损失20.1亿多元。全市共计损失（不包括当时的解县）222亿元。

1939年阎锡山配合蒋介石反共高潮，在山西发动“12月事变”，破坏抗日统一战线，镇压抗日武装。直到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艰难的相持阶段，阎锡山还与日寇秘密